

美国政治与社会

## 美国的人口结构变化和社会不平等

魏南枝 常 夷\*

**【内容提要】** 美国的人口正在朝低生育率、老龄化、族群多样化和家庭结构多元化等趋势发展，并且东西海岸地区较之于内陆地区更具有种族和族裔的多元性。美国经济持续复苏未能对近年来美国经济结构所发生的“劳资关系”失衡性变化进行有效纠偏，从种族、收入、财富、机会等多个角度分析，美国社会的不平等性仍处于加剧进程之中，中产阶级规模趋于萎缩。人口结构的变化与社会不平等加剧交织在一起，正在改变美国的社会结构，构成了当前美国各种社会冲突和分裂的基础，也推动了美国政治对立的加剧，并对美国外交“内向化”走向形成影响。

**【关键词】** 社会不平等 人口结构 社会结构 社会冲突  
美国政治

---

\* 魏南枝，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常夷，现就职于国家版权局中国版权保护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法学博士。

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福格尔分析，“平等主义是一种民族道德准则，或者更准确地讲，平等思想的产生是导致美国从分散的殖民地变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并最终导致平等主义成为全民族信条的主要因素之一”<sup>①</sup>。21世纪的今天，美国的人口趋势正在朝低生育率、老龄化、族群多样化和家庭结构多元化等方向发展，已经与建国之初的美国人口结构大不相同。并且，由于深受全球化、技术革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公共政策等因素的影响，美国的社会不平等正在日益加剧，被帕特南视为即将“走向两个美国”<sup>②</sup>。纵然如此，绝大部分美国人仍然同意如下原则：“在美国每个人都应当有获得成功的平等机会。”<sup>③</sup>

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经济在数字表现上处于复苏之中，但经济复苏并未带来大多数人生活水平的改善，种族冲突和文化认同冲突等多种社会冲突都在加剧。这些冲突和危机本质上都是不同群体对稀缺资源的争夺，特别是在人口结构性变化之下，如何分配社会稀缺资源所反映的平等与不平等的伦理判断具有诸多不确定性，使社会不平等成为当前美国诸多矛盾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不但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的政治对立，也影响着美国外交的走向。

## 一、人口结构的变化

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17年11月公布的人口数据显示，美国的总人口数达到3.26亿左右，是世界人口第三大国。自2014年到2060年期间的美国人口变化呈现低生育率、老龄化和族群多样性变化（“从几乎是白色婴儿潮文化到全球化多民族国家的转型”）三个要素相结合的特点。此外，美国单亲家庭比例急剧上升、宗教人口构成变化，以及东西海岸地区的人口较之于内陆地区更具有种族和族裔多元性等因素正在改变美国的人口社会结构。

<sup>①</sup> [美] 罗伯特·福格尔：《第四次大觉醒及平等主义的的未来》，王中华、刘红译，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sup>②</sup> [美] 罗伯特·帕特南：《我们的孩子》，田雷、宋昕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8页。

<sup>③</sup> Benjamin I. Page and Lawrence R. Jacobs, *Class War? What Americans Really Think About Economic Inequa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pp.57—58.

### (一) 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增长缓慢

尽管美国的生育率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不算太低, 据统计, 2016 年美国生育率为平均每个妇女生育 1.82 个孩子, 但仍低于生育率 2.1 的世代更替水平, 并且各年龄组的育龄妇女的生育率都在呈下降趋势。<sup>①</sup>由于美国的传统主体族群——欧洲裔白人的生育率低于少数族裔, 导致美国“土生人口”(native born) 出生率持续下降, 为了保证劳动人口规模不萎缩需要引入移民, 到 2060 年将有 18.8% 的美国人“外国出生人口”(foreign born)。

根据 2015 年发布的《当前人口报告: 2014 年》(简称《人口报告》) 预测, 2014 年到 2060 年期间美国新出生人口的母亲, 按照其出生地进行区分, 20.3% 为“外国出生人口”, 79.7% 为“土生人口”。从中长期看, 约束经济增速的主要威胁来自人口的缓慢增长, “土生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不利于美国经济迅速复苏, 因此为了解决人口萎缩的问题, 需要有“外国出生人口”的持续增长, 也即需要有 6 410 万新移民进入才能保证美国总人口的基本稳定增长。<sup>②</sup>

### (二) “婴儿潮”一代退休导致的人口老龄化

随着“婴儿潮”一代进入退休年龄, 到 2030 年 20% 左右的美国人口将是 65 周岁以上的老人, 这个数字在 2060 年将达到 24%。18 周岁以下年龄组占人口总数的比重在持续下降, 2014 年至 2060 年间, 美国 18 周岁以下的人群占人口总占比将从 23% 下降到 20%, 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将从 62% 下降到 57%, 65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将从 4 600 万翻番为 9 800 万。尽管没有西欧和日本严重, 美国亦将迎来人口老龄化问题, 并且与“土生人口”相比, 这一问题在“外国出生人口”群体中更为突出。

美国在未来四十年里的人口出生率将会持续缓慢下降, 而移民的增长也因种种因素陷入相对停滞。无论是从产出要素、还是从需求方面来说, 人口赡养

<sup>①</sup> Brady E. Hamilton, Joyce A. Martin, Michelle J.K. Osterman, Anne K. Driscoll & Lauren M. Rossen, “Births: Preliminary Data for 2016,” *National Vital Statistics Reports*, Washington: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June 2017.

<sup>②</sup> Sandra L. Colby and Jennifer M. Ortman, “Projections of the Size and Composition of the U.S. Population: 2014 to 2060,”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Washington D.C.: U.S. Census Bureau, 2015.

比的上升和劳动年龄人口数的下降都会对美国经济增长构成消极因素，也不利于增强美国的社会活力。此外，“外国出生人口”老龄化程度比“土生人口”更严重的问题，成为特朗普政府着力反对链式移民的主要依据，认为占据美国移民绝对主体的链式移民不但消耗联邦财政资源，还有半数以上移民家庭依赖联邦和各地福利项目。<sup>①</sup>

### （三）各族群生育率差异导致的族群多样性变化

美国人口的种族与族裔多样性处于进一步多元进程之中：通过对美国 2000 年和 2010 年两次人口普查结果可以发现，在这 10 年里，欧洲裔白人的人口净增长仅为 200 万人左右，增长率接近 1.2%；而同期少数族裔人口净增长 2 500 万人口，其中拉美裔白人（主要是墨西哥人）增长了 1 520 万人左右，增长率达 43%；亚裔增长了 440 万人，增长率达 43.3%；而黑人增长了 12.3%。欧洲裔白人占全国人口比重持续下降，2010 年少数族裔人口已经占全国人口的 36.3%，而 2000 年少数族裔人口仅占 30.9%。<sup>②</sup>

根据 2011—2015 年美国社会调查，名列美国人五大血统的有：德国裔（14.7%）、非洲裔（12.3%）、墨西哥裔（10.9%）、爱尔兰裔（10.6%）和英国裔（7.8%），即欧洲裔白人仍占据人口多数。<sup>③</sup>然而，从单一族群的对比来看，到 2060 年欧洲裔白人所占人口比重将仅为三成多，并将于 2044 年从多数族群变为“主要的少数族群”。未来人口增长最快的三个族群分别为：多族裔、亚裔和拉美裔，其中拉美裔到 2060 年将占据美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此外，18 周岁以下的人口变化现状及趋势表明，欧洲裔白人在这一年龄组的现有比例（52%）和未来趋势（2060 年为 35.6%）都很低，也就是说，在这一年龄组，美国的欧

<sup>①</sup> White House, “It’s Time to End Chain Migration,” Dec. 15,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articles/time-end-chain-migration/>.

<sup>②</sup> U.S. Census Bureau, “Overview of Race and Hispanic Origin: 2010,” *2010 Census Briefs*, Washington, Mar. 2011; “Overview of Race and Hispanic Origin,” *2000 Census Brief*, Washington, Mar. 2001.

<sup>③</sup> U.S. Census Bureau, “ACS Demographic and Housing Estimates, 2011—2015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5-year Estimates,” [https://factfinder.census.gov/faces/tableservices/jsf/pages/productview.xhtml?pid=ACS\\_15\\_5YR\\_DP05&prodType=table](https://factfinder.census.gov/faces/tableservices/jsf/pages/productview.xhtml?pid=ACS_15_5YR_DP05&prodType=table).

洲裔白人孩子已经接近成为“主要的少数族群”。<sup>①</sup>

即使排除移民因素，美国“土生人口”的各族群生育率差异将导致欧洲裔白人在未来的人口结构中不占主体族群优势。对于一个由欧洲白人首先建立政府，经历持续种族斗争，甚至近两年还爆发种族冲突和激烈的限制移民争论的国家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性事件。这说明，尽管欧洲裔白人仍将是最大的单一族群，但美国将处于没有任一族群超过总人口半数的多元人口结构之中。

#### (四) 人口结构和宗教信仰变化导致的宗教人口构成转型

信仰基督教的欧洲裔白人曾经是美国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宗教群体，但是，随着移民的大量进入和美国人口结构的日益多元化，美国的宗教人口构成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发生了很大变化，白人基督徒已经只在不到半数的州占据人口多数，且普遍存在基督徒老龄化问题。

美国公共宗教研究所发布的《变化中的美国宗教身份》报告显示，2016年信仰基督教的欧洲裔白人已经仅占总人口数的43%，其中信仰新教的仅占30%，而福音派新教徒比重已经降至17%、圣公会教徒比重降至13%、天主教教徒比重降至11%；非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等）的信众比重有所上升（人数仍低于10%），但伊斯兰教（42%）、印度教（36%）和佛教（35%）的信众为30岁以下的年轻人；大约三分之一的自称没有宗教归属的美国人是在30岁以下的年轻人，与此相反的是老年美国人中信仰基督教的比例更高；52%的30岁以下天主教教徒为拉美裔白人，而信仰天主教的欧洲裔白人比重从25年前的87%降至55%；有20个州的人口以没有宗教归属的美国人为主体，而接近半数的LGBT<sup>②</sup>美国人属于没有宗教归属的美国人；仅有29%的美国民主党人是基督教欧洲裔白人，而福音派新教徒仍是美国共和党的主导性宗教力量（35%的共和党人自称为福音派新教徒、而73%的共和党人加入了基督

<sup>①</sup> Sandra L. Colby and Jennifer M. Ortman, "Projections of the Size and Composition of the U.S. Population: 2014 to 2060,"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sup>②</sup> LGBT是女同性恋者(Lesbians)、男同性恋者(Gays)、双性恋者(Bisexuals)和跨性别者(Transgender)的英文首字母缩略字。

教白人宗教群体)。<sup>①</sup>

### (五) 传统家庭比重萎缩导致的家庭形态多元化

根据劳工部的劳动参与率统计,20世纪60年代初妇女大都在结婚后生育孩子,今天大约有四成的妇女选择单身或与同居者生活期间生育,不但导致妇女劳动参与率的持续上升和妇女成为家庭主要经济来源,而且导致美国家庭形式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sup>②</sup>而近年来的美国社会调查显示,美国传统的双亲家庭的比重由于离婚率、再婚率和同居率的上升而持续下降,已经从1960年的占比为73%降至2014年的46%。与美国亚裔妇女长期保持低生育率和欧洲裔白人妇女的生育率自“婴儿潮”之后迅速萎缩相反的是,近二三十年涌入美国的拉美裔移民妇女保持了高生育率。美国单亲母亲的比重从20世纪60年代的5%左右迅速攀升、在2007年前后达到最高值(51.8%),2016年降至39.7%的水平,但黑人单亲母亲占比为69.7%、拉美裔为52.5%、欧洲裔白人为28.4%、亚裔为12%。<sup>③</sup>近年来的新特点是,生育非婚生子女的主体不再是单亲母亲,而是处于同居状态的母亲。并且,受教育程度较高(获得学士学位)的父母保持传统双亲家庭的比重越高,对子女的教育重视程度越高。<sup>④</sup>

美国家庭形态的变化使得当今美国社会不再有主导性的家庭结构模式,而单亲家庭比重的居高不下以及其背后存在的族群和阶层差异等,导致美国存在严重的儿童贫困率问题,大约有1500万美国儿童(占儿童总人数的21%)生活在联邦贫困线以下的穷困家庭之中<sup>⑤</sup>,甚至根据《2017年美国教育发展现状

<sup>①</sup> Daniel Cox & Robert p. Jones, "America's Changing Religious Identity," Sep.6, 2017, <https://www.prii.org/research/american-religious-landscape-christian-religiously-unaffiliated/>.

<sup>②</sup>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Employment Characteristics of Families: 2016," *USDL-17-0444*, Apr.20, 2017, <https://www.bls.gov/news.release/pdf/famee.pdf>.

<sup>③</sup> Brady E. Hamilton, Joyce A. Martin, Michelle J.K. Osterman, Anne K. Driscoll & Lauren M. Rossen, "Births: Preliminary Data for 2016."

<sup>④</sup> Kim Parker, Juliana Menasce Horowitz & Molly Rohal, "Parenting in America: Outlook, worries, aspirations are strongly linked to financial situation," Pew Research Center, Dec.17, 2015, <http://www.pewsocialtrends.org/2015/12/17/1-the-american-family-today/>.

<sup>⑤</sup> National Center for Children in Poverty, "Child Poverty," <http://nccp.org/topics/childpoverty.html>.

报告》显示，2014—2015年公立小学和中学仍有2.5%的学生无家可归。<sup>①</sup>

### (六) 各族群分布变化所形成的地区差异性

自20世纪末开始，美国的种族和族裔多元化不再局限于大都市和东西海岸地区，而是通过美国国内少数族裔的迁徙和国际移民的大量进入逐渐向广大乡村地区延伸，将曾经是欧洲裔白人占据绝对主导的地方逐渐改变为多元群体混居区域。其结果是，大约有1000多个城镇、100多个县、4个州（加利福尼亚州、得克萨斯州、新墨西哥州和夏威夷州）和哥伦比亚特区成为没有主体族群的地区；而缅因州、佛蒙特州、西弗吉尼亚州和新罕布什尔州是多元化程度最低的几个州。<sup>②</sup>

与上述种族和族裔多元化程度差异性同时存在的是美国地区差距的日益扩大，以2015年度的各地区贫困率为例，密西西比州的贫困率高达22%，亚拉巴马州、阿肯色州、肯塔基州等贫困率居高不下，呈现东西两侧海岸线地区整体富裕、内陆和北部地区偏贫穷，金融业和高科技产业地区整体富裕、传统工业区和农业区偏贫穷的格局。<sup>③</sup>

上述“土生人口”与“外国出生人口”的不同发展趋势、人口老龄化、欧洲裔白人主体地位的逐渐丧失、族群结构失去主体族群的趋势、家庭结构变化和族群地区分布差异性等因素彼此融合，导致了美国人口特征的结构化变化，对美国的经济、政治生活及其身份认同感都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 二、社会不平等的加剧

尽管一个更加多元化的年轻群体构成了未来美国人口结构的基础，但当前

---

<sup>①</sup>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The Condition of Education 2017," Washington: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May 2017, <https://nces.ed.gov/pubs2017/2017144.pdf>.

<sup>②</sup> Barrett A. Lee, Michael J.R. Martin, Stephen A. Matthews & Chad R. Farrell, "State-Level Changes in U.S. Racial and Ethnic Diversity, 1980 to 2015: A Universal Trend?" *Demographic Research*, Vol.37, Article 33, Oct.2017, pp.1031—1048.

<sup>③</sup> "New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Statistics For Income, Poverty and Health Insurance Available For States and Local Areas," Sep.15, 2016, CB16-159.

美国社会仍是一个欧洲裔白人主导的社会，不同族群之间的差异性客观存在甚至在某些方面趋于恶化。同时，各族群内部的贫富悬殊不断扩大，阶层矛盾已经难于被族群矛盾所掩盖，而是与族群矛盾纠缠在一起。并且，从收入、财富、机会等的不平等性等多个方面判断，美国的社会分层和阶级固化等问题不断凸显，构成了美国社会分裂问题日益严重的基础性原因。

### （一）族群之间的不平等性

自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普遍性的社会不平等开始加剧，但不同族群陷入社会固化和下行社会流动等陷阱的时间段不同：例如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较大比例的黑人工人阶级就因产业空心化等遭受劳动力市场排斥，而欧洲裔白人工人阶级迟至21世纪初才从曾经“比较容易地上升到较高的社会阶梯”<sup>①</sup>变成了和黑人、拉美裔和中低层移民一样深受阶层固化之苦。

21世纪以来，美国各族群之间和族群内部获得教育、健康和居住等基本资源的机会不平等性持续扩大，例如2007年美国每十万人有767人被监禁，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增长了7倍；美国黑人仅占全国人口的12%—13%，但在监狱人口中黑人却占将近40%，其中20周岁到39周岁之间的黑人高中肄业生的三分之一被监禁，而同年龄段同类型欧洲裔白人的监禁率为13%。<sup>②</sup>不同族群之间工作机会的数量和质量差异明显，例如劳工部数据显示，2017年12月美国的官方失业率为4.1%，而黑人为6.8%，高于平均数2.7个百分点。<sup>③</sup>2016年全年平均失业率为4.9%，亚裔为3.6%、欧洲裔白人为4.3%、拉美裔为5.8%、黑人为8.4%；2016年劳动参与率最低的是黑人（61.6%），白人为62.9%、亚裔为63.2%、拉美裔为65.8%。<sup>④</sup>不同种族在就业方面的差异性取决于诸多因素，例如受教育程度、所处

<sup>①</sup> [德]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1886年2月），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9月第1版，第296页。

<sup>②</sup> Ta-Nehisi Coates, “The Black Family in the Age of Mass Incarceration,” *The Atlantic*, Oct. 2015, <http://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5/10/the-black-family-in-the-age-of-mass-incarceration/403246>.

<sup>③</sup>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Dec. 2017, Washington D.C.: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sup>④</sup>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Labor Force Characteristics by Race and Ethnicity: 2016,” Report 1070, Oct. 2017, <https://www.bls.gov/opub/reports/race-and-ethnicity/2016/home.htm>.



行业、工作地点、就业歧视程度等。

在相同的教育背景和资历的情况下，不同族群之间的劳工薪资差距也较明显，拉美裔和黑人的平均收入大幅低于欧洲裔白人与亚裔；从贫困率进行比较，拉美裔美国人和黑人都远高于欧洲裔白人和亚裔，凸显出族群不平等所造成的集中贫困问题的严重性。<sup>①</sup>2013年欧洲裔白人家庭财富中位数是黑人家庭财富中位数的13倍、是拉美裔家庭财富中位数的10倍，而在2008年分别为8倍与9倍，表明不同族群之间的家庭财富的差距在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大衰退之后迅速扩大。<sup>②</sup>并且，过去三十年里，欧洲裔白人家庭的财富增长速度是拉美裔家庭的1.2倍左右、是黑人家庭的3倍左右。<sup>③</sup>

## （二）族群内部的不平等性

2017年9月公布的《美国收入和贫穷报告：2016年》（以下简称《收入报告》）显示，各族群内部的阶层差距在持续扩大，被经济全球化逐渐“拉平”的是各族群中底层民众的就业机会、收入水平与财富状况。<sup>④</sup>也就是说，同一族群内部贫富两极分化在加剧，具体表现为欧洲裔白人、亚裔、拉美裔和黑人中有钱的更有钱，而同族群穷人却每况愈下。<sup>⑤</sup>

根据该《收入报告》，2016年度美国的贫困率为12.7%，仍比2000年高出1.4个百分点。其中欧洲裔白人的贫困率为8.8%，低于其他族群，但由于其人口基础大，有1730万欧洲裔白人处于贫困线以下，这批贫困人口主要是美国传统白人工人阶级，并且主要分布在传统工业区，也就是现在被称为“铁锈带”

<sup>①</sup> Bernadette D. Proctor, et al., "Income and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5,"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Washington D.C.: U.S. Census Bureau, Sep.2016.

<sup>②</sup> Rakesh Kochhar and Richard Fry, "Wealth Inequality Has Widened along Racial, Ethnic Lines Since End of Great Recession," Pew Research Center, Dec.2014, <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4/12/12/racial-wealth-gaps-great-recession/>.

<sup>③</sup> Dedrick Asante-Muhammad, et al., *The Ever-Growing Gap: Without Change, African-American and Latino Families Won't Match White Wealth for Centuries*, Washington D.C.: The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2016.

<sup>④</sup> Jessica L. Semega, Kayla R. Fontenot & Melissa A. Kollar, "Income and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6,"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Washington D.C.: U.S. Census Bureau, Sep.2017.

<sup>⑤</sup> [美] 罗伯特·帕特南：《我们的孩子》，第38页。

的俄亥俄州、路易斯安那州等地。

亚裔的贫困率为 10.1%，有 190 万亚裔处于贫困线以下。亚裔在该年度的家庭收入中位数是各族群中最高的（81 500 美元），高于欧洲裔白人（65 041 美元），但是亚裔的贫困率却高于欧洲裔白人，说明亚裔内部的贫富悬殊程度高于欧洲裔白人。拉美裔美国人家庭收入中位数为 47 675 美元、贫困率是 19.4%，有 1 110 万拉美裔处于贫困线以下；而黑人家庭收入中位数为 39 490 美元、贫困率为 22%，有 920 万黑人处于贫困线以下。

从上述数据分析可知，尽管欧洲裔白人的贫困率是各单一族群中最低的，但其一方面处于族群人口数量下降的趋势之中，另一方面相对于最高峰值，其实际家庭收入中位数仍处于下降趋势之中，因而该族群特别是中下阶层对本轮美国经济复苏未能保护其利益的不满情绪增强。拉美裔美国人与黑人的家庭收入水平显著低于亚裔与欧洲裔白人：实际家庭收入中位数不仅最高峰值显著低于后者，而且还远低于所有族群的平均值；并且贫困率高达亚裔与欧洲裔白人的两倍，<sup>①</sup>导致拉美裔美国人与黑人对种族不平等的不满情绪上升。

### （三）收入的不平等性

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在 2014 年 9 月至 10 月间发布了一系列有关美国收入差距的公告和文章。其数据显示，2010 年至 2013 年间，美国人的平均收入上升了 4%，但是实际家庭收入中位值下降了 5%，也就是相当部分美国人的收入被平均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2010—2013 年美国家庭财政变化》认为，在 2010—2013 年间，收入最底层的美国人的实际收入在持续下降，处于 40%—90% 之间的美国中产阶层的收入上涨幅度微乎其微，而只有最上层的 10% 的美国家庭的收入迅速上升——也就是说，收入底层的 90% 的美国人收入有所下降，越是低收入阶层下降得越厉害；与此同时，顶层 10% 的人群收入有所增长。<sup>②</sup>

<sup>①</sup> Jessica L. Semega, Kayla R. Fontenot & Melissa A. Kollar, "Income and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6,"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Lawrence D. Bobo, et al., "The Real Record on Racial Attitudes," in Perter V. Marsden (ed.), *Social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Findings from the General Social Survey since 1972*,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sup>②</sup> Jesse Bricker, et al., *Changes in U.S. Family Finances from 2010 to 2013: Evidence from the 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 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Sep. 2014, Vol. 100, No. 4, pp. 9—10.

根据“世界顶级收入数据库”的统计分析，美国收入顶层1%的人群占总收入的比重在20世纪70年代和其他七国集团国家差不多；但是自1987年开始该比重迅速增长，由1970年的8%上升到了2015年的18.39%，包括资本收益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更是高达22.03%。此外，收入顶层1%的人群所得到的包括资本收益的平均收入为136.3977亿美元，而收入顶层0.01%的人群所得到的包括资本收益的平均收入高达3161.6431亿美元。<sup>①</sup>对比2015年美国公布的联邦贫困线标准为2个人的家庭收入须在15930美元以下，可见美国在收入层面的贫富悬殊已经非常巨大。《世界不平等报告2018》发现，自2000年以来劳动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显著下滑，资本收入在美国高收入人群总收入中所占份额迅速上升，而美国的所得税累进性却大幅下降，导致美国个人收入差距水平扩大。<sup>②</sup>也就是说，当前资本收益率远高于劳动收益率，这就进一步恶化了财富层面的不平等性。

#### (四) 财富的不平等性

根据美联储的系列报告，2010年至2013年间，美国只有财富顶层的前3%的人群保持财富增长，剩下来的97%的人群财富都在缩水，其中财富底层的90%的人群自2004年以来一直呈财富缩水态势，财富顶层3%—10%之间的人群自2010年以来呈财富缩水态势。最富有的3%的美国人所拥有的财富在2010年占据财富总量的61%，而到2013年已经攀升到63%。奥巴马时期通过强制提高最富有阶层的税率，维持收入差距不至于大幅恶化，但并未在根本上改变收入差距和财富分配差距持续恶化的趋势。<sup>③</sup>也就是说，收入不平等在财富分配方面体现出“雪球效应”：大部分收入被最高收入群体所赚取，这些人将收入所得进行投资或储蓄继而获得更大的资本收益，反过来进一步加剧财富集中。<sup>④</sup>

<sup>①</sup> World Top Incomes Database, *Top 1% National Income Share*, <http://www.wid.world/#Country:2>.

<sup>②</sup> World Inequality Lab, *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18*, <http://wir2018.wid.world/files/download/wir2018-summary-english.pdf>.

<sup>③</sup> Jesse Bricker, et al., *Changes in U.S. Family Finances from 2010 to 2013: Evidence from the 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 pp.10—12.

<sup>④</sup> Emmanuel Saez & Gabriel Zucman, “Wealth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13: Evidence from Capitalized Income Tax Data,” *NBER Working Paper* 20625, 2014.

### （五）机会的不平等性

美国目前不断恶化的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共同造成了机会不平等现象的加剧。大量美国人，特别是拉美裔和黑人等，由于其所处环境而束缚了其创造力和劳动参与能力：例如美国的教育存在诸多不平等，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获得成功的机会具有很大影响；又如美国的司法和执法领域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1984年美国各州和联邦的囚犯主要是白人，而到了2014年65%的被宣判的囚犯都是少数族裔，以罚款、保释等形式为代表的财产性处罚更使得受罚者所在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其接受何种刑罚方式具有关键性意义；再如妇女在劳动力市场遭遇就业、工资等种种歧视。

按照“边际生产力理论”，高收入者往往与更高的生产力、对社会有更大贡献联系在一起，一定程度的贫富悬殊能够促进对资源的高效利用和提高整体社会生活水平。但是，如果这种贫富悬殊与个人的努力无关，而是植根于机会不平等性，这就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都造成损害。<sup>①</sup>机会不公平性的增强与社会流动性降低是密切相关的，具体表现为工人在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趋于下降：在更换雇主、变更职位和行业等方面的频率和能力都在萎缩；1985年以来，新企业进入率整体趋向萎缩；工作跳槽所能获得的受益幅度在下降；职业注册率在上升，导致需注册职位的人员跨州流动性受到制度性阻碍……上述现象表明，劳动力市场所能够提供的流动性下降导致通过个人努力工作改变命运的概率下降，也就是机会不公平性在增强。<sup>②</sup>

## 三、共同产生的多重影响

由于美国的人口结构正处于一个“多数族群变少数族群”和“少数族群变多数族群”互为因果的转型期，而多个维度的社会不平等情况正在加剧。即欧

<sup>①</sup> The White House,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2016*,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6, pp.22—41.

<sup>②</sup> Jason Furman, *Three Challenges in the U.S. Labor Market: Participation, Inequality, and Fluidity*, Jan. 2016,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sites/default/files/page/files/20160128\\_three\\_challenges\\_us\\_labor\\_market\\_slides.pdf](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sites/default/files/page/files/20160128_three_challenges_us_labor_market_slides.pdf), pp.22—28.

洲裔白人的人口比重不断下降、由占美国总人口的绝对多数变为“主要的少数族群”，而各少数族群人口数之和从占美国总人口的少数增长为占六成多——二者同时发生作用的结果是美国人口结构的多样性和不再有主体族群。

与此同时，在全球化浪潮之下，美国的经济结构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产业空心化导致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走弱，高科技产业和金融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发达所形成的金融—实体结构畸形化，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 80%，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化淘汰了大量学历低、靠体力劳动维持生计的工人，技术工人和低层次工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加大，带来低层次劳动力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和首次收入分配的贫富差距扩大。其结果是中产阶级规模趋于萎缩，从家庭数量分析，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比重已经从 1971 年的 61% 萎缩为 2015 年的略低于 50%，已经不再占据社会经济结构的主体。美国向来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著称，而今美国社会结构的“金字塔化”对美国人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以及其身份认同都具有广泛的影响，既构成不同形式的社会冲突与分裂的来源，也因此加重了不同层次的政治对立，并推动了美国当下的外交转向。

### （一）社会分裂

与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文化国家不同的是，美国是一个典型的没有“土生文化”而是以移民文化为主的国家，其文化基础很大程度受到文化背景不同的移民及其所形成的不同种族构成和族群人口规模的影响。在亨廷顿看来，哪怕将来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后裔在美国人口中的比重很小，只要绝大部分美国人认同盎格鲁—新教文化，美国就能够长久地保持其为美国。而一旦这种认同不复存在，如他所担心的，“美国将有两种文化（盎格鲁和拉美）和两种语言（英语和西班牙语）……难于保持文化和政治上的完整”<sup>①</sup>。但是在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和社会不平等性加剧二者相结合的作用之下，这种文化和政治上的完整性正在受到冲击，社会处于各种冲突与分裂之中。

第一，族群结构多样化所形成的“反移民”思潮。移民被称为美国经济与

<sup>①</sup> [美] 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9 页。

社会的“活化剂”、有利于推动美国经济繁荣，但其占人口比重变化和构成变化等，将不可避免地给美国本土文化和心理带来冲击，使得移民问题成为美国社会与政治的核心议题之一。一些反移民主义者担心，20世纪末以来大量进入的新移民将造成未来美国“语言和精神上的分裂”，<sup>①</sup>并进而对以盎格鲁—新教文化为核心的美国传统文化认同产生冲击。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土生”美国人因种族和族群不同而生育率存在巨大差异，在低生育率惯性的推动下欧洲裔白人占人口多数的主导地位将在21世纪中叶消失。与族群结构多样化同时存在的是美国文化多元主义者把持着“政治正确”话语权，西班牙语等日益成为美国的常用语言，数百万非法移民被特赦，拉美裔美国人在大选和地方性选举中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从不同侧面似乎在佐证美国“语言和精神上的分裂”。反过来，这种分裂的可能性引发了美国保守社会力量的“反移民”思潮，其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是如何界定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强调的“真正的美国人”的范畴——不仅是“反移民”，而且是“反文化多元主义”，构成了右翼保守主义和左翼文化多元主义之间冲突的社会基础。

第二，家庭形态多元化所导致的针对政府社会福利开支的社会对立加剧。美国的单亲家庭和贫困儿童的比例居高不下，其结果是通过卫生保健、住房、营养和儿童保健等所提供的非现金援助以及税收优惠等提供的现金援助越来越成为“刚性”需求；而为了保持美国的长期竞争力，需要用教育和培训来帮助单亲父母和年轻人更加自给自足、帮助儿童获得必要的教育等，也增强了美国各级政府教育支出的“刚性”。然而，针对日益“刚性”的社会福利开支，美国社会的对立情绪在加重：一方面，大量少数族裔和移民要求保持甚至增加社会福利与放宽移民政策；另一方面，如霍克希尔德所发现的，“路易斯安那州的工人们辛勤工作，却面临随着年龄增长、收入不断下降的窘境……而且他们越来越被排除在就业市场之外的同时，其他人却在‘插队’：例如女性、黑人、新移民、难民等等。”<sup>②</sup>与长期以来依赖政府救助或慈善救济而生存的黑人与拉美裔不

<sup>①</sup> Peter Duignan and L. H. Gann, *The Debate in the United States over Immigration*, Stanford, Californi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8, p.37.

<sup>②</sup> 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Anger and Mourning on the American Right*, New York: New Press, 2016, pp.131—141.

同，这些遭遇排斥和插队的美国传统白人工人阶级是盎格鲁—新教文化的支持群体，他们视因失业或贫穷到不得不依赖政府救济为耻辱。<sup>①</sup>由于其长期以来基于主体族裔的优势地位受到冲击，他们对大量少数族裔依赖福利而生存的现状表示强烈不满，不但加剧了不同种族和族群之间的对立，而且产生了白人社会内部的分裂情绪。

## （二）政治对立

第一，各族群分布的地区性差异对美国政治“红蓝”格局的影响。虽然种族和族裔的多元性不再局限于大城市和东西海岸地区，美国族群分布和经济发展的地区差距与2016年美国大选所体现的红州（共和党领先）和蓝州（民主党领先）的分布有着密切关联性。并且，2016年美国大选出现了“乡村白人”和“城市少数族裔”相对立的格局，即种族和族裔更多元的都市人口更倾向于希拉里，而白人聚居区和乡村地区人口更倾向于特朗普，内陆和北部地区以红州为主、东西两侧海岸线地区以蓝州为主，构成了美国两党政治的区域性分隔基础。

第二，宗教人口构成多元化对美国“红蓝”政治格局的影响。美国宗教人口构成变化既深受美国人口结构多元化的影响，也是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文化多元主义影响的结果。两党各自宗教色彩的差异性正在扩大，共和党仍以基督教白人宗教群体为政治基本盘，而民主党力图以文化多元主义来扩大其对多元宗教群体和多元族裔的影响力，这就进一步使得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和政治极化呈加剧趋势。

根据2016年的人口统计，“千禧一代”（18—35岁）的人口数为7980万人，已经远远超过“婴儿潮”一代（52—70岁）的人口规模（7410万人），而2016年美国宗教信仰情况调查显示，以盎格鲁—新教文化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对“千禧一代”的影响力式微，他们更倾向于自由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这意味着共和党有“失去未来”之虞，极大影响着未来的美国政治版图。此外，目

---

<sup>①</sup> James T. Patterson, *America's Struggle against Pover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前占人口多数的美国基督徒的宗教影响力正呈下降趋势，例如 2015 年 6 月美国大法官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判决就说明了这一点，这对美国传统价值观人群形成了强烈冲击，认为这不仅破坏了美国的传统家庭价值观、还是对新教教义的挑战。<sup>①</sup>

基于现状和未来的双重危机所产生的“文化不安全感”使美国传统价值观人群的包容性和吸引力趋于衰减，将愤怒情绪转换为行动的能量迅速聚集，因此以白人种族主义为代表的一批极右翼力量近年来从边缘走向中心，爆发了与“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等左翼社会力量之间的冲突，2017 年的弗吉尼亚骚乱就是其力证。两党和一些社会团体出于政治利益所需，还会有意鼓吹甚至挑拨种族矛盾来赢得选票或资源，这将进一步恶化两党之间的对立。

第三，族群结构多样化和社会不平等性恶化对美国政治议题的影响。广义上的种族隔离并没有消失，因种族问题导致的集中贫困问题在不断恶化却被主流媒体选择性忽视，种族歧视被视为“政治不正确”，但无法掩盖事实上的歧视和社会分化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其结果是 2007 年爆发的经济大衰退加剧了美国的资源稀缺性和分配不公正性，仅仅依靠种族平等的“政治正确性”共识已经不足以阻止美国种族冲突再度激化，这种激化本质上是阶层隔离与种族隔离交替而生的产物。但是，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美国政党的主流意识形态都会从不同角度出发强调机会平等、淡化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具体表现为两党政治较量的焦点和各自政治议题的设置。从过去两年的美国政治的具体实践来看，尽管 2016 年大选凸显了社会底层与统治精英的对立，但是，2017 年以来的这种对立迅速被转移：要么以盎格鲁—新教文化认同和多元文化认同冲突为代表，以某种“文化内战”的形式体现出来；要么以白人至上主义与“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冲突为代表，即以种族冲突的形式体现出来。二者都在发挥类似的作用，即掩盖事实上的经济社会不平等之下的阶级矛盾。

---

<sup>①</sup> Linda C. McClain, “Civil Marriage for Same-Sex Couples, ‘Moral Disapproval’, and Tensions Between Religious Liberty and Equality,” in Timothy Shah, Thomas Farr & Jack Friedman eds., *Religious Freedom and Gay Rights: Emerging Conflic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80—132.



### (三) 外交转向

美国的人口结构转型和社会不平等性增强在相当程度上也是美国创立和主导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由秩序和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结果，随着产业空心化、各地区和各族群发展高度不平衡、贫富悬殊扩大等带来的美国国内矛盾的恶化，取而代之的是“去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和各种冲突的此起彼伏。这些浪潮和冲突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国内支持全球化力量和反全球化的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力量之间的对立。反全球化浪潮构成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的民意基础，各种形式的冲突构成特朗普努力迎合自己政治基本盘、忽视促进社会与政治共识形成的社会根源，二者成为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在外交领域进行转向的共同原因。

第一，从强调全球秩序转向“美国优先”。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基于其政治基本盘的利益诉求，特朗普政府强调建设一个以“美国优先”为原则、即更注重本国利益的美国，因此不再以全球秩序稳定为重点，而是采用经济民族主义和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呈现出“内向化”的趋势，例如美国在 2017 年进行了一系列“退群”：1 月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6 月宣布退出《巴黎协定》，10 月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 月宣布不再参与联合国主导的《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制订进程。又如特朗普政府要求重新谈判美加墨自贸区协定，以及美韩、美欧、美中等双边贸易安排等。

第二，从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并主导全球秩序的定位转向“全球公共产品供应商”的定位。基于这种定位转变，特朗普政府的构想是要求盟友承担更多成本、世界各国向美国“购买”公共产品，被变相“输血”的美国因此能够“再次强大”并保持主导世界的的能力。但这种新的定位改变了美国与欧洲、日本、韩国和印度等地区或国家的现有关系、特别是安全利益模式，例如“印太战略”事实上会增强以日本、印度为代表的周边国家遏制中国的意愿和能力。

## 四、结 论

美国的人口构成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美国的人口社会结构处于历史性的转折期。与此同时，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美国的实际家庭收入中位数仍

然低于 40 年前的水平，而占据顶层的美国人的财富和收入均在不断膨胀。中产阶级空心化所体现出来的不平等现象加剧，既摧毁了人们对于实现合理程度的机会均等的希望，也加固了美国政治权力运行中实际存在的因资本权力差异而产生的权利不平等性，社会幸福感的降低远远超出了常规国内生产总值标准所体现的程度。这种人口、社会结构的变化与社会不平等性加剧等相结合，形成了越来越难以逾越的阶层之间的机会鸿沟——这种机会鸿沟导致机会平等原则丧失其现实土壤，不仅导致美国的社会分裂日益加剧，也在破坏政治平等，<sup>①</sup>不但使美国的政治对立不断恶化，也因此影响着美国外交的转向。

---

<sup>①</sup> [美] 罗伯特·帕特南：《我们的孩子》，第 268 页。

Localism Populism

**Donald Trump's Immigration Reform and Contemporary Predicament**

..... *Wang Congyue*

[Abstract] Although at the end of 2016, Donald Trump, as a political novice defeated Hilary Clinton with his propaganda of immigration reform characterized by ultra-nationalism as well as restrictionism is seemed to be bizarre, this paper believe that the only way to understand his reform is to unveil those political stunts while evaluate those executive orders and files from content to influence subjectively, besides, take a historical and global perspective to explain his reform is obvious necessary. Under this circumstance, this paper try to demonstrate the main features of his reform and make three judgments furtherly: firstly, the immigration policy und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ill turn out to be more rigorous than before with an uncertain outlook. Secondly,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risis along with the clash of ideologies results in the complication of anti-immigration periodically, which is utilized by Trump to push forward the immigration reform. Thirdly, restrictionist immigration policy cannot help to ease the division and polarization domestically meanwhile create a sustainable diplomatic environment, which ultimately trapped American in a new dilemma.

[Key Words] Donald Trump Immigration reform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U.S. Demographic Trend & Social Inequality**

..... *Wei Nanzhi Chang Yi*

[Abstract] The U.S. demographic trends are as following: fertility rates are continue to fall, the aging population is continue to grow, the increasing minority population and decreasing majority population is making the U. S. population more diverse, and the two-parent household is in decline. Moreover,

Americans of east and west coasts are more racially and ethnically diverse than those of inland regions. Up till now, U.S. economic recovery has not effectively rectified the unbalanced labor-capital relations. The racial and ethnic inequality, income inequality, wealth inequality and opportunity inequality are still worsening while the share of Americans who live in middle class households is shrinking. As a result of the interplay of economic recovery, population change and worsening inequality, U.S. demographic trends and social structure together forms the resources of current social conflicts and fragmentation. Meanwhile, it promotes the U.S. political polarization and influences the transition of U.S. diplomacy.

[Key Words] social inequality composition of population social structure social conflicts U.S. politics

#### Analysis of Donald J. Trump's Trade Policy

..... *Ma Xue*

[Abstract] Priorities of Trump trade policy are to place domestic laws on WTO rules, strictly foreign trade investigations and enforcement, and gain more market share for U.S. products and achieve better trade agreements. From the campaign to the White House, Trump made a lot of controversial trade policy remarks, which upon further examination, are in fact consistent with the established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difference is that Trump is more inclined to use the “tit for tat” tactics, and unilateral pressure on the U.S. foreign trade partners. Trump’s trade policy not only pays attention to the interests of its political base demands, but also responds to the appeal of the U.S. mainstream interest groups, which earns him extra political points. Though his trade policy frees up more market space for U.S. companies and U.S. —made products, it will distort the role of market alloc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United States’ preferred trade policy will also impact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 profoundly and negatively.

[Key Words] Donald J. Trump Trade Policy The U. S. Trade